

政治信任:心理学视角下的前因后果*

刘建平^{1,3}, 杨 铖^{1,2}

(1.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昌 330022; 2. 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昌 330099;

3. 江西省心理与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 南昌 330022)

摘 要: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是近年来政治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变量。研究主要从政治信任的概念、基础理论、特征、测量、相关前因及结果变量的比较及实证研究方面,对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梳理与评析。针对现有研究情况,提出未来研究应注意从测量客观性、实验室操纵、相关因素关系、多学科综合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政治信任;信任;测量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8)02-0171-07

1 引言

《孟子·离娄上》中写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概括说来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反之,政治不信任会带来怀疑、冷漠、恐慌、嘲讽、愤怒这种光谱式的由弱至强的后果,严重影响政治秩序稳定。任何国家都需要保持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以维持其合法统治和有效治理。在强调和谐社会的今天,政治信任仍是衡量民众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Levi, 1997; Levi & Stoker, 2000)。根据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对态度与行为关系的解释,了解公众的政治信任对预测其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大量的政治信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政治机构信任水平较低的公民较少参与制度化政治参与和经常进行系统性挑战的政治行为,并且他们更倾向不遵守法律(Hooghe & Marien, 2011),政治信任被认为是民主政权的基本指标(孟天广, 2014)。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看似下降的政治信任水平在西方国家吸引了相当大的学术关注。中国也不例外,政治学的实证研究自 90 年代起就积极关注政治信任,尤其在测量当代政治信任上做出了一定探索。文章试图把握政治信任的研究脉络,对政治信任的相关研究结果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一些探讨。

2 政治信任的概念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 Deutsch(1958)首次通过“囚徒困境”对信任进行实验研究。早期的信任研究大体从心理与行为两个层面进行。心理层面将信任理解为个体通过社会学习形成的相对稳定人格特质。行为层面将信任理解为对情境的反应。20 世纪 90 年代,两个重要的研究试图界定和扩展信任的概念。Mayer(1995)定义信任为一方心甘情愿的受到另一方的伤害。Rousseau(1998)将信任定义为:基于对另一方意愿或行为的积极预期而愿意接受自己处于不设防易受害境地的心理状态。信任的“另一方”可以指他人,也可以指企业组织,或者更广泛的社会机构(Barber, 1983)。这些定义提供了两个临界属性,即积极期望和愿意承受伤害。大多研究采用 Mayer(1995)文章中关于信任及其维度的定义,它适合检验企业和政党之间的信任。

综观信任的定义,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如何信任”。信任要么作为个体在认知决策方面审慎评价他人(Hardin, 2006),要么作为内在评价反应个体对他人如何感知及表现行为(Uslander, 2002)。第二个方面是“信任谁”。可以假设为特殊假设或一般假设。第三个方面是“信任对方什么”。比如单一信任指信任某个特别的方面。一旦数量从一个特殊事情增加到多个事情,单一信任会转化到社会信任。这些都表明信任具有相关性、条件性、判断性、启发性的特点。

* 基金项目: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SH071),2015 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XL1519),2015 年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15YB146),2012 年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12JY05)。

通讯作者:刘建平, E-mail:liujianping@jxnu.edu.cn。

政治信任是信任的一种,但又与一般信任不同。1974 年 Miller 首先提出政治信任概念,初期主要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后期,对象扩展到整个国家行政领域,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政治体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队和领导人等(Wong et al., 2011)。Easton(1965)和 Craig, Niemi 和 Silver(1990)认为政治信任是公众对政治系统、政府和政治家的绩效与期盼是否一致的信念。Levi 和 Stoker(2000)认为政治信任指公众对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相信他们会制定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并提供符合他们预期的政策结果。

一般信任指的是相信他人,多被假定为稳定的

人格特征(Uslander, 2002)。政治信任是基于对政治结构的信任感。这种评价多为基于人们获取的知识和信息,强调知识属性(Hooghe, 2011)。而一般信任来源于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的直接经验,不太需要抽象推理得出结论对方是否值得信任。政治信任会涉及被调查者的间接经验,大多居民接触政治的可能性不大,较少涉及直接观察和体验政治信任。因此,表达政治信任比表达一般信任需要更多抽象推理过程。所以,结合政治信任相关概念及认知特点,文章认为政治信任是公众对政府、执政党派、领导人或政府组织的政治行为结果符合其预期的心理体验。

表 1 政治信任的理论基础

理论名称	起源	形成	基本观点
文化生成理论 (Culture Theory)	以社会资本理论为根基	外生	基于态度、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等,源于个体青少年时期,成熟于成年期,是从生活中习得并受家族历史文化的影响。
制度生成理论 (Institutional Theory)	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根基	内生	基于个体对制度绩效、当权者的表现和收益等理性思考,并且受个体知识和经验的影响,完全经历认知机制。
终生学习理论 (Lifetime Learning Theory)	综合上面两个理论	终生	早期社会过程中就开始形成,早期的态度和信念被接下来的经验所强化或挑战。政治经验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比较稳定,但随着近期的经验和绩效评价的不同,政治信任也可能会有巨大变化。

3 政治信任的测量

由于研究设计的多样性,方法、模型、统计的差异,信任的概念和测量是讨论的重心。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经常采用两种态度类型调查项目测量信任:一种是关于对陌生人合作性和帮助性的期望,通常被称为一般社会信任(Fukuyama, 1995),另一种是对熟悉的比如朋友、亲戚协同性和帮助性的期望,通常被称为特殊社会信任(Freitag & Trautmann, 2009)。测量一般社会信任研究者多采用二分问题:“一般来说,你认为大部分人是可信任的,亦或你需要非常谨慎的对待他人(大部分人不信任)”? 测量特殊信任研究者多采用 Likert 等级来进

行评定:“你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你认识的人(朋友、亲戚、邻居)”? 这类方法广泛用于国家和跨国家的公共民意调查。尽管具有一定效用,但学者从三个方面质疑:第一,题项将信任与风险规避、信赖感等微观关联因素混淆(Fehr, 2009; Sapienza, Toldra - Simats, & Zingales, 2013)。第二,信任(特殊社会信任)的公共调查没有考虑不同条件下不同人群的作答差异性(Hardin, 2006)。比如没有区分信任(或不信任)陌生人(或熟人)。第三,被调查者易受各种各样反应偏见的影响,包括个人喜好和个人厌恶偏见、近因效应、期望效应等(SAndré, 2014)。

表 2 代表性政治信任测量问卷

代表性测验	测量方式	类型	特点
美国全国选举调查研究(NES)	政治信任操作化为 5 个方面,对应 5 个问题来测量。	直接测量	这种反应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
新民主晴雨表调查(NDB)	通过军队、警察、法院、政府、政党、议会、行政部门等组织的信任程度来描述。	间接测量	是人们对这些有关政治系统问题做出的理性判定,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评价判断,并由此具体判断推导出人们实际的政治信任程度。
欧洲社会调查(ESS)	通过 11 点(也有 4 点或 7 点)量表测量是否信任议会、法律制度、警察等一些机构。	间接测量	它的政治信任是基于一个时间段,而美国全国选举调查更多的倾向一个时间点政府的评价。
综合性量表	用政府信任、政治犬儒主义、现任者信任三个不同量表来测量政治信任的三个维度。	间接测量	政府信任选择的是 Craig et al(1990)的“政府信任量表”,结构效度为 0.6-0.65;政治犬儒主义采用 Agger et al(1961)编制的“政治犬儒主义二分量表”,重测信度达 0.943,肯德尔信度值为 0.643,结构效度为 0.71;现任者信任采用 Craig et al(1990)的“现任者信任量表”,结构效度达 0.73-0.85。

4 政治信任的相关研究

政治信任的前因和结果之争可以追溯到1974年的Miller和Citrin。Miller指出政治的犬儒主义是由对政策的不满引起,并会导致对政府系统的威胁。Citrin认为它仅会对官员的改选构成威胁,对政府系统不产生影响。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看似降低的政治信任状况刺激了更多关于对政治信任前因后果的研究。

4.1 政治信任的前因变量

4.1.1 人口信息

政治信任的降低有归咎于现代化及全球化。现代化意味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凸显教育的核心作用。较高的教育水平,加上多样的政治爱好和日益减少的对传统权威和体系的尊重,导致高学历公民对现行政治体系的不满(Aarts et al., 2014)。这种不满转换成对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对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公民也存在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首先影响那些在劳动力市场较缺乏竞争力的公民。在西方国家,工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所以很难更换工作(Kriesi et al., 2008),导致低受教育程度群体降低政治信任。这其中,Bovens和Wille(2010)提出的“文凭民主”指出需要通过教育变量去理解不同程度的政治信任。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结果就是政治舞台越来越成为一个高素质的、政治上成熟的公民可以参与的领域,低教育水平的公民越来越远离的政治领域(Bovens & Wille, 2010; Hakhverdian et al., 2012)。政治上的排斥也会威胁到经济上的排斥,这种排斥的感觉造成低教育水平和缺少政治经验的公民更加愤世嫉俗和不信任。

对中国公民的研究发现性别对政治信任没有显著作用,但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多的政治关心,女性表现出更多地政治冷漠;文化大革命前后出生的人没有显著的年龄效应;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表现出更高的政治信任。区域收入增长比例对政治信任没有显著影响,但家庭收入水平和对财务的满意程度与政治信任有显著正相关。

Kesler和Bloemraad(2010)发现种族的多样性也会降低政治信任。从1964至2004的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数据显示,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的政治信任情况类似,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最高。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的政治信任在1994年最低,分别为16%和20%,之后,非裔美国人最高值是1998年回

升到36%,白人2002年回升到57%。黑人比白人更能适应党派的变化去信任政府。

4.1.2 政治因素

Elina Kestilä - Kekkonen(2016)用制度绩效理论解释个体在横断和纵向政治信任波动的差异。横断方法目的是评定制度绩效对居民政治信任的相对冲击。纵向方法是从解释性角度理解制度绩效理论预测时间推移后政治信任的变化。研究采用欧洲社会调查中对芬兰2004~2013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制度绩效评价对政治信任有显著影响:对政府和经济满意解释了个体和时间的偏差,社会信任和国家福利表现也具有强预测性。

Bouckaert等(2001)从管理、公共行政、社会、经济四个方面来解析人民对政府不信任的原因,指出政府管理绩效的不佳以及政府行政体系的超载是造成人民对政治信任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他学者则认为,选民人数的不断下降、公民参与水平的不断降低、经济低迷以及公民认为政府无力解决现存的财政与金融危机、政府无效率、浪费公款并花费在错误的政策、社会资本存量的减少等则是造成公众政治信任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谢治菊(2011)指出从制度理论视角看,政府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体现公共政策(过程和结果)评价、政治效能感、腐败感知度、相对剥夺和生活满意度。其中公共政策评价和腐败感知是稳定的前因变量,政治效能作用只体现在农村模型中。从文化理论视角看,政治犬儒主义和权威主义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在城市模型中有体现,在农村模型中未有体现。

政治利益也是政治信任的一个比较强的预测变量(Anderson, 2002)。降低的信任很难恢复,政治信任同时受负面媒体内容、腐败信息、公民的政策满意度、人际信任和业余生活等因素的影响(Damico, 2000; Huang, 2007; Abrajano & Alvarez, 2010)。

4.1.3 心理发展

Šerek和Macek(2014)通过1116名11、15、17岁青少年的纵向研究分析得出,青春早期具有高口语认知能力的青少年,在青春晚期具有高政治信任。青春早期的儿童接受越多的父母关爱,在青春晚期也呈现更多的政治信任。

Schoon等(2010)对8804名1958年出生的英国人的11岁和33岁两个年龄节点进行了追踪研究,发现人们童年期的认知能力与社会态度和政治

信任正相关。

有研究指出社会智力也是关键。智力就是允许个体决定与他人交际互动的动机(Yamagishi, 2001),是正在发出或潜在的背叛或不信任行为的重要因素(Bacharach & Gambetta, 2001)。几项基于英国数据的研究指出智力与一般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存在积极关系(Yamagishi, 2001; Sturgis et al., 2010; Schoon, Cheng, Gale, Batty, & Deary, 2010)。

4.1.4 其他

有研究指出父母的社会地位对子女的政治信任有一些影响。对女性而言,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成就部分中介了童年期认知能力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对于男性而言,主要通过职业成就部分中介童年期认知能力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人们具有越高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倾向于更高的政治信任。从社会经济背景来看,人们越远离特权家庭,表现出越低的政治信任。

Faulken, Nicholas, Aaron 和 Kyle (2014) 对被试呈现廉洁、正直的词语联想任务会影响政治信任。Mutz 和 Byron (2005) 发现在实验室中用电视播放不礼貌的言行会形成启动效应,短暂的降低政治信任。

经济产出与政治信任也呈现共变波动。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随着收入下降、高失业率和飙升的通货膨胀,政治信任也是显著下降。在 Reagan 总统当政的中期,随着经济复苏,政治信任也随之上升,仅在 90 年代末经济下行时再次下降。在 Clinton 总统执政期间,即使有相关丑闻,政治信任随着经济上行也呈上升趋势。但是,在实验性证据面前,个体公民经济认知有时对信任有显著效果,有时亦无。尽管,时间序列分析佐证了经济对信任的一致性影响,但它可能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影响(Li, 2016)。

4.2 政治信任的结果变量

相比于政治信任的前因变量,其结果变量较集中于政治学领域,大致可以区分为心理类影响和行

4.2.1 心理类影响

Hetherington 和 Nugent (2001) 发现,政治信任会影响公众对于政治权力如何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分配的态度。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度也同样受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信任水平越高,公众对牺牲自身物质利益支持公益政策的程度就越高(Chanley, Rudolph, & Rahn, 2000)。

Baltatescu (2009) 解释了信任的不同形式和维

度对主观幸福感有不同影响。通过 2005 和 2007 年欧洲社会调查数据发现,信任的构念和主观幸福感相关,不同区域的欧洲人有差异。当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欧洲西部人群的人际信任比政治信任更能预测主观幸福感,东部反之。

陈光和谢星全(2015)基于 CGSS2010 数据分析了政治信任与集体行动态度之间的关系,政府信任对公民集体行动态度具有负向影响;但受不公正经历调节,不公经历 U 型调节政治信任与集体行动态度之间的关系,在高政治信任同时认为受到不公对待的群体中,高政治信任会带来高集体行动态度。

4.2.2 行为类影响

学者们认为高政治信任有助于现任政府在行为方面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相当证据说明政治信任利于公民顺从行为产生及政策执行。有信任感的公民赞同政府的规章制度,并更加愿意赋税(Schiffman, Thelen, & Sherman, 2010)。反之,低政治信任的公民不满意政府行为,特别是再分配政策需要损失个体利益的时候更容易产生低政治信任(Hetherington & Globetti, 2002)。第二,政治信任的恶化与积极的政治参与相关。低政治信任容易产生反政权行为(Hooghe & Marien, 2011)。第三,低政治信任水平会引来对政府的不稳定。Li (2004) 的研究指出低政治信任的农村居民更愿意越过地方政府进而支持中央政府。并且如果一国的政治系统失去了民众的深厚信任而沦为特权势力的工具,民众就会将其利益维护和获取的主要渠道转移到非政治性的家族、教会、行会等信任对象上去,消极政治参与的态势就会蔓延开来。

政治信任对执政者成功和有效的执行政策营造了政治环境(Hetherington, 2001, 2002)。下降的信任引发更少的对分配政策和遵守法律的公众支持(Chanley, 2002)。政治信任的下降在发达城市被认为会威胁到城市民主的合法性。同时,移民改变了人口的结构,带来了民主参与的负面影响(Kesler & Bloemraad, 2010)。

5 小结与展望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政治信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研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信任的测量方法、前因及结果变量等方面。但同时有些方面值得未来进一步完善。

5.1 提升测量工具的客观性

政治信任测量方式多为主观测量,测量内容有

时也与社会信任交织。所以,就政治信任的性质来讲,政治信任的最佳描述是状态还是特质?在人格心理学中,状态和特质的区分是基于观察主观经验或行为模式形势下个体呈现相对暂时稳定和一致性的水平。更准确地说,个体在行为、思想或感觉的差异范围通过时间和形式决定它的稳定性。如果一个变量符合这种情况,那就称之为特质,如大五人格。尽管个体大五人格呈现高稳定性,但仍然会根据情境特点和需求产生变化(Robert & DelVecchio, 2000)。

为了理解如何整合个体差异的稳定性不同于个体行为的可变性。Fleeson(2001)提出了特质比作状态的密度分布方法。它假设短暂的行为、思想和感觉可以通过相同的维度被描述成人格状态,这些维度可以描述成行为、思想和情感综合倾向等特质水平上的个体差异。通过时间和情境因素,个体经常展现出来的不同状态水平被认为是密度分布的形式。然而,通过情境因素,人们展示了相当大的可变性,比如有时内向有时外向,他们的行为也会加权,形成相当稳定的一般趋势。换句话说,个体的各种状态分布定位(情境因素下个体平均水平)和分布区间(状态的变化等级)就是人们的特点和与他人的区别。

Fleeson 和 Leicht(2006)应用特质是状态的密度分布方法去研究信任并调查人际信任中人与人之间的可变性。他们要求每个被试在每个测量场合都要思考他们最近的一次人际互动,并且估计他们对互动对象的信任程度。这个研究揭示了通过互动环境和互动对象,在人际信任中人与人之间的可变性和个体差异一样都处在较高水平。它们揭示了特质是状态的密度分布方法可运用到人际信任、政治信任之类的特定关系变量中。

5.2 加强实验室操纵方法

政治信任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较多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多以思辨为主,少量实证研究也多为一般社会调查(Li, 2004),实验室研究较少,操纵性研究寥寥无几(张琦,王二平, 2010)。

Sigelman, Sigelman 和 Walkosz(1992)率先应用实验室研究范式探究人们对政治官员评价的影响因素。在权威信任的实验室研究中采用文字描述对高-低权威信任进行操纵。在 Kees, Wilke 和 Lind(1998)的研究中,当被试阅读完实验情境之后,高权威信任组的被试会被告知“你的某一位好友告知

你可以信任基金会成员,他过去在和该基金会成员打交道时感觉很不错”,而低权威信任组的被试会被告知“你的某一位好友告知你不可以信任基金会成员,他过去在和该基金会成员打交道时感觉很糟糕”。De Cremer 和 Tyler(2007)也采用类似方法操纵权威信任。虽然政治信任可以看做权威信任的一种,是国家组织情境下的权威信任,但以往实验室研究的变量操纵往往只关注组织情境下的权威信任,采用小群体的研究范式,较少尝试将权威信任的操纵方法拓展到对政治信任的探究上。Mutz 和 Reeves(2005)在实验室中通过电视曝光无礼行为短暂的降低了被试政治信任,据此发现了政治信任的启动效应。并采用给被试假设一个政客身份,通过廉洁正性词汇描述和负性词汇描述进而操纵被试政治信任。

5.3 厘清影响因素的关系

有研究从认知机制强调教育作为社会分类机制的重要性,而不是直接影响政治信任(Nie, Junn, & Stehlik - Barry, 1996)。受过更高教育使他们更容易书面陈述对居民和政治系统的信任,不仅因为他们能理解文化规范,高地位也意味着他们更加免疫欺骗和背叛的影响。这种强烈的社会地位和信任水平之间的关联性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在可信度上存在高水平的代际传递(Uslander, 2008),尽管继承性并没有在所有研究中被确认(Dinesen & Hooghe, 2010)。基于这个逻辑,可以认为教育与信任并不直接相关,但其间接相关,因为提供了接触特权位置的机会。这些复杂研究使我们认为机制之间互相关联,高智力被期待获取更多有声望的社会地位。而认知和社会分类机制显然是兼容的,重要的是尝试解决机制,利于洞察信任发展。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来源于政府对民众实际利益情况的衡量,类似于人格特质,政治信任也具有一定稳定性,但在不同情境下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张警吁(2010)研究指出威胁状态下,民众的政治信任会产生变化,而且不同政治信任程度的个体面对威胁时的行为表现也不一致。Wang 和 Zhang(2016)的研究指出在不同的情境下(灾难情境或非灾难情境),分配公正感和程序公正感对政治信任和合作行为的中介作用大小存在差异。灾难情境下,分配公正感的中介作用更强;非灾难情境下,程序公正感的中介作用更强。

5.4 加大多学科综合研究

由于学科属性的影响,目前政治信任研究较多

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及部分管理学的领域中,且多为理论或一般调研性研究。研究者在探索政治信任的前因、结果、中介、调节变量,及其具体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方面尚存在进步空间。并且,政治信任与信任、政府信任、制度信任等因素的理论框架、特征、关注重点等的区别比较研究可以有效促进政治信任操作性定义的发展(张书维,2017)。

不可否认,政治信任作为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关键变量,它的有效性同样体现在它是否能在预测个体和团体层面公民态度和行为时超越其他变量的解释力。未来研究可以从人格特质和情境分析的视角来探讨政治信任在本土化研究中的有效性,推动相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 陈光,谢星全.(2015).从治理视角观察社会冲突、认同危机与社会正义问题(专题讨论):公平感知、支出压力和政治信任与社会冲突的逻辑关系研究——基于 CGSS2010 数据的结构方程建模.《黑龙江社会科学》,2,35-41.
- 孟天广.(2014).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信任:实证测量与全貌概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3(2),1-10.
- 谢治菊.(2011).政治信任的含义、层次(结构)与测量——对中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述评.《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2(4),10-15.
- 张警吁.(2010).威胁状态下政治信任的变化及其对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科学院大学.
- 张婧,王二平.(2010).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心理科学进展》,18(10),1620-1627.
- 张书维.(2017).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心理学报》,49(6),794-813.
- Aarts, Kees, Thomassen, Jacques, & Ham, Carolien van. (2014).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J. J. A. Jacques Thomassen (Ed.),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Represent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pp. 201-231).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ltatescu, S. (2009).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interpersonal and political trust on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Oradea, Oradea, Romania.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2139/ssrn.1952595>.
- De, C. D., & Tyler, T. R. (2007). The effects of trust in authority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on cooper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3), 639-649.
- E Kestilä - Kekkonen, P. (2016). Political Trust, Individual - level Characteristics and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Finland.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39(2), 138-160.
- Faulkner, N., Martin, A., & Peyton, K. (2014). Priming political trust: Evidence from an experim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1), 164-173.
- Fleeson, W. (2001). Toward a structure - and process - integrated view of personality: Traits as density distributions of stat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 80(6), 1011-1027.
- Fleeson, W., & Leicht, C. (2006). On delineating and integrating the study of variability and stability in personality psychology: Interpersonal trust as illustr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0(1), 5-20.
- Freitag, M., & Trauttmüller, R. (2009). Spheres of trus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foundations of particularised and generalised trus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8(6), 782-803.
- Hooghe, M. (2011). Why there is basically only one form of political trus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2), 269-275.
- Huang, F. (2007). *To trust or to monitor: A dynamic analysis*.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Bras Basah, Singapore.
- Kesler, C., & Bloemraad, I. (2010). Does immigration erode social capital? the conditional effects of immigration - generated diversity on trust, memb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across 19 countries, 1981-2000.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 43(2), 319-347.
- Li, L. J. (2016). Reassessing trus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five national surveys. *The China Quarterly*, 225, 100-121.
- Li, L. J. (2004).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0(2), 228-258.
- SAndré. (2014). Does Trust Mean the Same for Migrants and Natives? Testing Measure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Trust with Multi - group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5(3), 963-982.
- Sapienza, P., Toldra - Simats, A., & Zingales, L. (2013). Understanding trust. *The Economic Journal*, 123(573), 1313-1332.
- Schiffman, L., Thelen, S. T., & Sherman, E. (2010). Interpersonal and political trust: Modeling levels of citizens' trust.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44(3/4), 369-381.
- Schoon, I., Cheng, H., Gale, C. R., Batty, G. D., & Deary, I. J. (2010). Social status, cognitive ability,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s predictors of liberal soci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trust. *Intelligence*, 38(1), 144-150.
- Šerek, J., & Macek, P. (2014). Antecedents of political trust in adolescence: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perceptions of parents.

-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5 (4) , 284 – 293.
- Sturgis, P. , & Smith, P. (2010) . Assessing the validity of generalized trust questions: What kind of trust are we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2 (1) , 74 – 92.
- Wang, Z. X. , & You, Y. (2016) . The arrival of critical citizens: Decline of political trust and shifting public prioriti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385 (2) , 1 – 20.
- Wong, K. Y. , Wan, P. S. , & Hsiao, H. H. M. (2011) . The bases of political trust in six Asian societies: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explanations compar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2 (3) , 263 – 281.
- Wang, Z. X. , & You, Y. (2016) . The arrival of critical citizens:

The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Trus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Liu Jianping^{1,3}, Yang Cheng^{1,2}

(1. School of Psycholog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2. School of Marxism,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99;

3. Jiangxi Key Laboratory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Nanchang 330022)

Abstract: Political trust is a key factor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search area in the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the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political trust, including its concept, fundamental theory,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s, comparison with other leadership factors, and empirical analyses. Based on the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studies, this study further provides suggeste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 e. focusing on the objectivity of the measurements, improving laboratory manipulation, exploit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orrelative factors, and conducting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Key words: political trust; trust; measurements